



# 陈可冀



## 阜外带我走上中西医结合之路

陈可冀的中医情怀，要从他年少生病时，父亲常带他去找中医医治说起。当时，福州城里有一位名中医，名叫叶焯藩，处方字迹极其工整洒脱，令他毕生不忘。给他开的治疗鼻炎的处方中多有辛夷，俗称木笔花。章太炎曾专论此药，对此他印象深刻。

他家离一家医院很近。因常常目睹患者解除病痛时的欢欣与丧失亲人时的痛苦，他的心中逐渐树立了学医救人的远大志向。

小时候埋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长大后，陈可冀将悠久古老的传统医药学推向了现代，他在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方面的研究，开创了

新的理论体系，不仅影响全国，甚至被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同行所接纳，被认为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个典范。其主持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我国中医药界获得的第一项最高科技奖项。他被聘为WHO传统医学顾问，并受邀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HCLA）及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等单位做学术讲座。

陈可冀院士对“活血化瘀”的兴趣是从阜外医院开始的。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与中医研究院开展多项目协作，陈可冀和著名老中医赵锡武教授、郭士魁研究员等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紧密协作，研究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和冠心病。在此后的20余年间，陈可冀和阜外医院保持着密切的协作关系。

他说，阜外医院就像他的第二母校，让他的现代心血管病学知识水平有了较大的长进。现在想起来，每每让他感到甚是感恩与温暖。为此，2014年，陈可冀主动申请参加在厦门由阜外医院等单位召开的“新荷花论坛”，讲述他与阜外医院的故事。

## 遇见黄宛

陈可冀说，黄宛是他学习和进入心脏病学领域的启蒙老师。

1959年和1964年，陈可冀两次参加阜外医院主办的心电图学及心脏内科医师进修班。1959年的心电图学进修课程是由黄宛教授和方圻教授两人每天轮流主讲，为时1个月余。

陈可冀还记得，那时黄宛教授才40岁，方圻教授比他小一岁。黄宛教授很严肃，陈可冀甚至有些害怕他。第一次踏进他的办公室，黄宛教授问：“你是哪里毕业的？”陈可冀说是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

黄宛教授又问：“认识王中方教授吗？”

“认识，他是我们的内科主任。”陈可冀回答说。



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电图进修班结业合影。黄宛（前左2）、方圻（前右3）教授授课。陈可冀（三排左3）与徐涛医师（三排左1）等参加学习

原来，黄宛教授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当实习医生时，王中方教授是住院医师，正好是黄宛教授的老师。这样一聊，陈可冀与黄宛教授的关系就近了一些。

陈可冀回忆，黄宛教授非常严格，每周临床查房时，并不让医师们看着病历汇报患者病情，他所问的问题，都要求医师能记住数据和背诵回答。

1959年，在心电图班进修时，没有什么多媒体之类的教学或幻灯片等先进条件。黄宛教授和方圻教授拿着1米多长的木制“两脚规”在黑板上比划测量心电图的各项数据，以便大家理解。他们的讲课十分生动精彩，给陈可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由此入了门。

1964—1965年，陈可冀脱产整整一年，在阜外医院心内科医师进修班学习。按照阜外医院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必须24小时“住”在病房的五楼，夜间随时听候患者召唤，每天一大早起来，在查房前自行抽血做完有关患者出凝血时间等项目的准备工作，并先后轮转到临床各专科及其他医技科室学习。

这些培训增进了陈可冀对心血管病学知识的掌握，为他日后开展心血管疾病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

## 弦脉研究

依据中医传统学术思想，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声学教授马大猷的协助下，陈可冀研制成以酒石酸钾钠和钛酸钡为换能原件的“寸关尺脉搏描记仪”，把脉诊所得的机械能转换成电能，由著名老中医蒲辅周、杨树干把脉，对 400 例 17 种脉象描记图与心冲击图、心电图及心音图做了同步描绘。此为我国早期的压电晶体式脉象仪。

1959 年，在黄宛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张锡钧教授的指导下，陈可冀进行了高血压病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根据弦脉记录图形将其分为三级。

为了探讨高血压病弦脉的产生机制，陈可冀等 8 名健康志愿者分别在自己身上静脉滴注去甲肾上腺素做试验。由张锡钧教授推荐用 von Euler 法测定，结果发现体内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增加到一定浓度，或身体对该物质敏感度的增加，是形成弦脉的主要机制之一。

《高血压病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这篇文章后来经黄宛教授亲自修改，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62 年第 10 期上。陈可冀回忆，黄宛教授很重视这项研究，还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予指导，并介绍一本 Wiggers CJ 著的《生理卫生与疾病》（*Physiology in Health and Disease*）作为参考。至今，陈可冀仍然感激于心。

## 29 岁与黄宛、邝安堃同台做学术报告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西药降压药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陈可冀和同事们在赵锡武教授、郭士魁研究员和黄宛教授的指导下，将 262 例高血压患



1964年9月至1965年8月在阜外医院进修，前排右10为吴英恺院士，右9为蔡如升副院长、右5为刘玉清院士、右3为胡旭东医生、右6尚德延教授、二排右7为陈可冀

者分为八种类型进行辨证论治，即在阳亢、阴虚阳亢、阴虚、阴阳两虚和阳虚为纲的基础上分为肝热上冲、肝风、怔忡、胸痹、中风等8个证型，分型论治。这种方法对症状缓解有确切疗效，但只对轻度高血压患者效果明显。

通过对高血压病分证型治疗的研究观察，陈可冀认为，高血压病的中医分型与高血压病分期之间确有一定联系。高血压病的初期患者多表现为实证，病变重心在传统医学认为的“肝”；中期多为虚实兼见，病变则在“肝肾”；后期多为虚证，病变重心在“肾”。据此辨病与辨证合参，对指导高血压病的临床治疗可能有所裨益。但是他们认为病与证并非完全对应。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对高血压病是按血压水平、靶器官损伤程度及病因学三种方式进行分期、分型及评定疗效。陈可冀提出，虽然这种方式可被传统中医参考借鉴，但高血压病的治疗目的并非只是单纯的降压、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还应包括“改善机体各系统的功能水平，以及适应社会环境能力等的生存质量”，即应同时观察其相关的证候演变。

这个结论写成论文后，1959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心脏血管疾病学术会议上，受到吴英恺院士的鼓励，陈可冀做了大会报告，同一天上午的报告还有邝安堃教授的高血压非药物治疗、黄宛教授的动脉粥样硬化研究进展报告。当时陈可冀年仅29岁。

## 走上中西医结合循证研究之路

陈可冀在阜外进修学习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有的患者每周要含用一瓶（100片）硝酸甘油来缓解疼痛，但应用活血化瘀方药后，可以减少硝酸甘油用量，有些患者从每周100片减少到只需20片左右。

联想到中医药传统理论认为“气流通，百病已”及“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的观点，其与现代医学有关改善心肌供血思路之间具有相通性，陈可冀认为，这是中西医结合较为容易的切入点，应该有“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思维，陈可冀暗自惊喜，从内心里憧憬着这项研究的光明前途。

1961年，陈可冀根据临床所见，发表论文，指出活血化瘀疗法的经典理论及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此后又留意积累病例。经过多次反复验证，完善了这种疗法。他对此始终兴致盎然。该研究也引起了阜外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同行的兴趣。当时的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还安排陈可冀在阜外医院讲堂做过几次相关的专题讲座。

1971—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地区成立了防治冠心病协作组，以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为组长，西苑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为副组长单位，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友谊医院等10多家医院参与协作。经过反复集体讨论与修订，最后选定以活血化瘀复方冠心2号为主要研究方剂。经10多家医院多中心合作观察，证明该方剂对630例冠心病患者治疗的有效率达80%以上，显效率为33%。这项集体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为防治冠心病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形成了辐射全国的所谓“活血化瘀现象”。近30多年来，由冠心2号复方演化出的复方或活性成分组成的新药达数十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冠心2号的面世，受到社会及业界的支持与鼓励。但在工艺制剂方面有所不足，患者服用量大。陈可冀与富有经验的陈在嘉、寇文镛教授等合作，决定改进工艺，提取有效成分，改制成“精制冠心片”。在陶寿淇教授的支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中为会长吴英恺院士，右1-3为苏鸿熙、黄宛、石美鑫教授，后排左5为方圻教授，2排右1为刘力生教授，3排左3为陈可冀教授

持下，经阜外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及西苑医院等几家医院合作，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交叉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其疗效显著，服用量减少，多年来为《中国药典》收录。

陈可冀、郭士魁与黄宛、陈在嘉、陶寿淇教授等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82年2月）上发表了《精制冠心病片双盲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112例疗效分析》一文。该文被公认为是我国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领域第一篇符合循证医学要求的临床论著。

从此，陈可冀更加坚定了活血化瘀的临床研究方向。“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做这个工作。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也不容易。”陈可冀说。在此之后，陈可冀在急性心肌梗死治疗、血瘀证诊断标准制定、活血化瘀药分类及其抗血小板活性作用、川芎嗪的创新研究、PCI术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等方面，继续进行了临床进展和分子机制方面的深入研究，并分别再次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还与号称协和才子的张之南教授等合作编著出版了《血瘀证与活血化瘀》一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

## “西学中”还应继续

后来，陈可冀在血瘀证和活血化瘀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挖掘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老年医学的历代中医药文献及临床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与中医药打交道 60 余年，其撰写的《清宫医案集成》获中国政府出版奖。继而又出版《清宫配方集成》，他由衷地感慨道：“中医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

陈可冀认为，根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的初步结果，中草药有 2 万多种，而我国自古代留下的 10 万册古籍中，有 1 万余册与中医中药学相关。现在的关键是要将古典文化、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求得创新发展。一方面要尊重并传承传统，另一方面要用多种模式尤其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去创新、发展。

陈可冀说，中医药确实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目前还没能被很好地深入挖掘。“有的部门学术民主作风不够，束缚了不同专业人员的思想，应该从体制上鼓励开展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在很多学科发展都是跨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理论和技术交叉，取得进展。中医学也要重视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交叉发展。”“过去大家看到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促进了理论研究进步，并提高了效果及其重复性。现在有些部门并不太看得上，把它边缘化了，没有全球化意识，这对中医药本身的进步而言，将是一大过失。”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国务院及卫生部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曾掀起西医学中医热潮。陈可冀说，屠呦呦就是参加过第三届中国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接受了为期两年半的中医培训，后来利用中医理论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很生动的事例。她在获奖感言中说，中药原是“一筐草”，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会发展成为“一块宝”。她的发言发人深省，感人至深。

陈可冀回忆道，刘力生、张之南、雷海鹏、朱预、刘干中、余铭鹏、葛

秦生、史济昭等，都曾参加过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过中医学，他们既有很坚实的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也曾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包括愈风宁心片的研究、天麻钩藤饮的研究等，说明他们是一群很有才华的优秀人才。“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后来没有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他们能坚持中西医结合之路，一定能做出比我们更多更大的成绩”，陈可冀不无感慨地说。随着西医学中医热潮的退却，“西学中”人才的培养也逐渐减少，甚至现在不允许交叉报考攻读研究生学位，西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许报考中医学研究生学位，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许报考西院校的研究生学位，在中西医结合专业中，“西学中”人才出现严重断档，极大地阻碍了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中西医结合”，这对大家是很大的激励。陈可冀说：“中西医应有共同的目标：提高临床疗效。医学首先应该是人学，治病救人。对患者要关怀，要安慰，使得治疗更合理。在这方面如何进步，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是我们无比重要的努力方向。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

## 与“家人”在一起

“阜外就像我的第二母校，使我在现代心血管病学知识水平上有较大的长进，且在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防治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拓展。”回忆起在阜外学习的点点滴滴，陈可冀不无感慨地说。

他说他从阜外学到很多东西。阜外人品德好、业务精湛、技术领先、态度认真，做学问严谨规范，学术上提倡互相协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现在这些优良品质还是继承了下来，培养了全国一批又一批的后备人才，不愧为我国心血管病领域的“黄埔军校”。他后来多次分别与钱貽简、陈在嘉、黄宛、方圻、陶寿淇教授等从事中央保健医疗任务，常常学习他们的好思想、



陈可冀院士（左一）与吴英恺院士在第7次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期间一起做心血管病保健问题讲座（1997年，京西宾馆）

好品德与精湛的业务水平。

所以，每每想起那些曾经教过他的阜外的“老师们”，他都感到甚是感恩与温暖。吴英恺教授喜欢出门带照相机。有一次在南京玄武湖，他拿着自己的相机给大家拍照。那时我是一个小大夫，总觉得他们应该很高高在上，但他们对这些小辈们其实是很随和的。他有一次跟我提起过他离开阜外医院的前前后后，难过地掉下了眼泪。他和我们这些年轻医生真的是完全没有隔阂。1978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在山西太原成立，吴院长是会长，我被选任常委兼秘书，他对我们晚辈很是爱护和信任。

黄宛教授看着很严肃，但在查房之余聊天，会讲到自己喜欢看京剧，讲到 he 刚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在餐馆吃饭，想听清楚邻桌美国人的细语很是吃力，过了一年英语听力才有进步等生活的小细节，我们都很爱听。

方圻教授更是随和，他每次见我，都叫“可冀”，到现在90多岁了也还是这样，很亲切。他写信要我关照一些患者的治疗，亲自来主持我的研究生答辩会。

陈在嘉教授查房非常严谨，对中西医结合非常支持，与名中医郭士魁合



陈可冀（左1）与方圻（左2）、毛守白（中）教授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会议（1983年，马尼拉）



陈可冀院士与吴英恺院士（中）、吴孟超院士（右）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1993年）

作堪称典范。她几十年如一日的认真细致，令我很钦佩。

刘力生教授很有才华，她与我的老伴陈维养同期系统地学习中医，她们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当年还曾在我那局促的小家里开过党小组会。

陶寿淇教授为了观察去甲乌药碱对心律失常的影响，在心电示波屏前坚持观察半小时或1小时，严谨而绝无一丝丝浮躁，甚为可贵。这项工作后来获卫生部甲级成果奖。

至今，陈可冀仍然记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刚刚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他第一次参加会议，与吴英恺院士在会议室门口迎面碰着，吴英恺院士拉着他的手说：“可冀，过五关斩六将啊！”这给了他很大的激励。这句话让陈可冀倍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

的荣誉，也激励着他在中西医结合领域不懈努力，破浪前行。

文 / 杨进刚 陈惠